

考古中国

新疆考古——

多元文化汇为一体的长卷

郭 物

新疆大地上的6处世界文化遗产、9545处不可移动文物与45万多件可移动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与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数代文博工作者薪火相传，潜心阐释文明密码，让文化遗产成为滋养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2017年起，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下，新疆考古制定了五年工作规划，梳理了主要的学术目标，考古工作进入系统全面和重点突出的新阶段。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得到大力的支持，相关课题被纳入“考古中国”的总体框架，“新疆早期文明综合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等课题取得了系统性的进步和突破。尤其是2018年开始，全国多家高校和考古机构参与到新疆的考古工作中，构建了“五湖四海”工作格局和“包罗万象”



▶ 考古工作者在北庭故城遗址发现的建筑构件。



的建筑材料形制与装饰母题均与中原地区同时代出土遗物相同，具有中原文化因素鲜明的特征。

石城子遗址考古发现与高昌故城附近“高昌壁”所属遗物及甘肃敦煌市悬泉置遗址、马圈湾遗址所出有关戍己校尉汉简资料结合，共同实证了两汉时期设立西域都护后有效管辖西域军政事务的辉煌历史。

新疆库车友谊路墓群的发掘，填补了库车地区春秋战国至元明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空白，深度展现了古代龟兹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生活，以及与中原地区存在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其作为新疆考古发掘原址展示利用的范例，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活化”提供了有效经验。依托砖室墓群建设的新疆首座地下博物馆“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获得广泛好评。

唐宋元时期的考古发现取得了重要进展。北庭和安西两个军政体系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对北庭故城遗址、奇台县唐朝墩遗址、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城、吐鲁番巴达木唐代高等级墓葬、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河古城遗址、哈密拉甫却克古城



▲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托普鲁克墩佛寺三号遗址出土的唐装人物壁画。

的研究格局。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继承前辈学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精神，前赴后继，艰辛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新疆早期文明综合研究”为课题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成果最为突出。首先是考古学文化体系初步建立，环东天山、天山北麓西段、阿勒泰地区、塔里木盆地东部等地区的文化面貌和编年相对清晰，文化源流和相互关系渐渐明确。塔里木盆地北缘发现了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天山南麓绿洲甚至沙漠腹地古河流沿线，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广泛分布的早期城址，为我们了解汉代西域三十六国的出现和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奇台石城子遗址考古对于深化新疆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考古人员通过6年多的系统勘探和发掘，确认其为东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遗址作为军事要塞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城内依托北面和西面城墙建有子城，形制与汉代边城的规制一致。单一城门以及城墙上角楼、马面等附属设施的建造更是体现出显著的军事遗存性质。石城子遗址遗迹丰富、使用时间短、保存完好，城内遍布

和墓葬等一系列的工作，使以北庭都护府为核心的北庭体系渐渐清晰。2005年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启动实施“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对北庭故城等14处文物保护单位开展系统性保护加固。

安西都护府的考古工作主要在城镇、关隘和烽燧方面取得突破，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文物证实其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游奕所“沙堆烽”，戍边将士不断换防，大量中原文学作品和传统经典被带入西域。文学作品《游仙窟》为中国现存唯一的实物标本，爱情悲剧故事《韩朋赋》、习字教材《千字文》《孝经》等丰富了相关版本。

围绕“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课题开展的考古引人注目，苏巴什佛寺、莫尔寺、西旁景教寺院等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收获颇丰，为进一步阐释新疆自古以来多元宗教并存的格局和宗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生动扎实的资料。

新疆博物馆建设快速发展。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克苏地区等的8个地州市级新馆相继竣工开馆，36个县市区级博物馆建设完成。目前，新疆现有各级备案博物馆、纪念馆150家，构建了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为龙头，地州市级博物馆为骨干，县市区级博物馆为基础，行业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为补充的博物馆布局。

考古人通过扎实的考古和研究，为实证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丰富内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提供重要的考古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河北博物院“山河永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革命文物展”中，冀南银行系列文物引人瞩目，它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金融战线的壮阔征程。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冀南银行，以“发展生产、经济斗争”为历史使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筑起坚实的金融长城，被誉为“新中国的金融摇篮”。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日军对根据地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金融掠夺，滥发伪币、强推“军用票”，国民政府则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给。在这样的危局下，创建根据地自己的银行、发行本位货币，成为关乎抗战生死存亡的战略抉择。

1939年10月，冀南银行在河南南官和山西黎城同时成立，首任行长为高捷成，太行、冀南同时宣布营业发行冀南币，逐步形成横跨太行、太岳、冀南三大战略区的金融网络。银行初创时条件极为简陋，工作人员没有固定场所，就以民房为营；缺少印制票币的设备和材料，采取就地取材、以土代洋和“取之于敌、虎穴取材”的办法克服困难。

冀南银行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抗战命运紧密相连。银行干部职工大多是久经战火考验的革命战士，他们怀揣“抗战救国”的信念，将银行建设视为抗日斗争的重要战场。在硝烟弥漫、险象环生的战争年代，冀南银行的革命先辈们昼夜行，随军辗转，账款物资常由马驮运输，战况紧急时则背负挎包随身携带，因此冀南银行被誉为“马背银行”“挎包银行”。1943年5月14日，高捷成在河北内邱遭遇日寇，在突围中为解救战友、保护银行机密文件而壮烈牺牲。这些饱经沧桑的文物，正是冀南银行的革命先辈们不畏艰险、不惧牺牲、服务人民、坚持抗战的生动历史写照。

作为太行、太岳、冀南三大战略区的本位货币，冀南币的发行流通绝非简单的金融行为，而是一场关乎根据地经济主权的“货币战争”。

冀南银行以大量战略物资为准备金，依据掌握的根据地粮食、棉花（布）、食油等物资灵活调节物价，巩固冀南币发行信用。针对日寇“以战养战”的掠夺政策，冀南银行坚决打击伪币和法币投机，通过大力宣传、建立冀南币识别组，组织经济游击队、禁止使用日伪币和肃清各类杂钞等斗争，打击了日伪的货币政策，抑制了土票杂钞，扩大了冀南币的流通范围，使根据地的金融市场趋向稳定和统一。抗战时期，冀南银行以近半数的发行额用来保障根据地军民的财政、军政经费，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给了根据地建设以有力的保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冀南银行的使命不断拓展。解放战争时期，冀南币的流通范围扩大到整个华北解放区，成为华北地区的法定本位货币。1948年10月1日，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组建华北银行；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井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中国人民币行，开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伍圆券印钞石版是河北博物院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发行人民币时使用的印刷母版实物，印证了石印技术在中国现代货币制造中最后应用阶段的史实。

从冀南币到人民币，从冀南银行到中国人民银行，红色金融事业在战火中孕育、在奋斗中成长，冀南银行作为“新中国金融摇篮”的历史地位，被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当年冀南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系列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新时代中华儿女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的精神源泉。

（作者单位：河北博物院）

▼冀南银行发行的拾圆钞票。



博物馆人工智能热的思考

魏
峻

如今，人工智能正从多领域、多层次重塑博物馆的展现形态与功能边界。

信息处理层面，人工智能是“超级助手”。对于博物馆中海量的藏品图片、文字信息和文献资料，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识别技术，可以自动完成数据提取、识别、分类。在内容生成层面，人工智能是“灵感源泉”。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被部分博物馆用来辅助开发教育项目和社交媒体互动，让博物馆的传播方式变得更多样有趣。今年大受欢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数字一大·不忘初心”、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那边是唐朝”等大空间VR沉浸式体验项目，就是数字孪生与AI+3D重建技术赋能文旅、活化历史的成功尝试。

在重塑体验方面，人工智能是“贴心伙伴”。人机交互技术能给观众提供便捷和个性化的参观服务，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22年推出的虚拟数智人“艾雯雯”，能够进行个性化讲解，深受观众欢迎。在藏品保护层面，人工智能是“全能守护者”。一些博物馆配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应用，部分实现了风险预警与自适应调控。

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将引发中国博物馆事业从理念到实践的双重升级。博物馆从信息传播者升级为意义生产共创平台，从传统服务升级为多元体验。这些升级正在持续重塑现代博物馆的价值逻辑。

然而，在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博物馆的初期阶段，其应用实践仍面临着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内容的准确性。训练数据偏差和算法黑箱等问题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生成不准确甚至错误信息，这会给人传播准确知识为使命的博物馆带来较大风险。人工智能的知识生产能力不足是另一显著瓶颈。人工智能擅长信息的重组与演绎，但目前还无法做出真正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进行内容生产，会削弱博物馆作为知识生产机构的核心功能。协同机制与行业标准欠缺也制约着人工智能在博物馆领域广泛运用。目前，我国博物馆的人工智能应用仍缺乏技术标准和整体规划，导致数据孤岛普遍存在，系统间难以协同共享。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人工智能应用恐将长期停留在“盆景点缀”的状态。此外，许多中小型博物馆受限于资金与人才，难以承担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引入与维护成本。

面向未来，博物馆在数字化浪潮中应着力于夯实基础、洞察需求和重构功能。基础建设不仅涵盖网络、算力等硬件支撑，也包括统一互通的数据标准和高质量的藏品数字资源库建设。通过充分的科学调研把握观众需求，并对人工智能的运用效果进行评估与持续改进，方能真正实现科技赋能博物馆发展。

对于博物馆来说，人工智能不只是辅助工具，更应成为激发创新与变革的催化剂，推动博物馆突破限制发展的无形“围墙”，成为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文化枢纽。

楚袂惊鸿越古今

田豆豆

上新了

龙飞凤舞于罗衾之上，虎啸龙吟于锦绣之中。“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屈原笔下的楚国女子，其华美的服饰到底什么样？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开展的荆州马山一号楚墓织绣品特展，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循着一丝一线，走入一场千年的梦——展厅入口处，一只造型奇丽、色彩缤纷的楚绣凤鸟，将人们带入这个战国时代的丝绸宝库。

丝织品是最难保存的文物品类，能以原有形态完整保存的更为稀少。1982年，人们在湖北省江陵县马山镇（今属荆州市）发现了一座不大的古墓，随着发掘的深入，大批保存完好、纹饰精美的丝织品惊艳世人。单衣、袍服、锦袴、鞋履形制完整，绢纱、罗绮、丝绦、锦绣应有尽有。这里几乎囊括了先秦时期所有的丝织品种类。此次展览共展出16件珍贵的丝织文物及3件复制品，通过“楚袂惊鸿”“衣绣锦缘”“溯源从之”三大单元全景式展现了战国楚人的服饰风华，楚国高超的纺织与刺绣工艺和马山一号楚墓的发掘历程。

“楚袂惊鸿”单元，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历经2年修复后首次亮相的一凤一龙相蟠纹绣紫红绢单衣。单衣为楚服的一种，与夹襦、直裾、颈部和袖口包边的样式令人十分眼熟，它便是今日“战国袍”最早的模板之一。因为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是目前研究战国丝绸服饰唯一的实物资料。近看，单衣上刺绣精美，凤龙盘绕，显示了楚人崇凤的图腾信仰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高度还原的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纹样精美。这件蚕丝填充的华丽绵袍上，刺绣着造型独特的三头凤，凤鸟的双翅勾形成了另外两个凤头。凤鸟的肚子圆鼓鼓的，仿佛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儿。三生万物，“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深刻，加上圆形的肚子，这充满想象的凤鸟形象承载着楚人祈愿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



工作室里，68岁的安宇歌轻抚一片薄如蝉翼的铁片，一串清越婉转的旋律便如溪水般流淌而出。这枚长不足10厘米的“小玩意”，正是被称为可吹出“女子心事”的宁夏民间乐器——口弦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安宇歌用半生时光，将千年古音从山野带向世界舞台。

1988年，安宇歌踏上非遗保护之路。彼时，口弦琴已几近绝响；会制作的老艺人相继离世，资料寥寥无几。她背上行囊，开始行走在宁夏的山间乡野。

一年寒冬腊月，她听说海原县有位口弦琴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对襟款式服装，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王郭骥摄影

口弦琴，塞上江南的千年古音

秦瑞杰

制作高手，便用大半个月工资雇了一辆农用车进山。颠簸5小时，到门口却只见铁锁挂门，村民告诉她，这家的男主人去新疆打工了。直到入夜，才等到女主人回来。晚上，安宇歌睡在这家人的土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恍惚间想：这风声，不正是口弦琴的呜咽吗？

采风十余载，这样的辛苦往返，成了安宇歌寻艺路上的常态。最艰难时，她背着幼子下乡。儿子李旭听着口弦琴声长大，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奏。如今，李旭不仅能制作造型独特的口弦琴，还协助母亲完善了口弦琴记谱。“他听口弦琴的神情，就像当年的我。”安宇歌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安宇歌在“祥云小屋”展示口弦琴技艺。一曲终了，外国观众围在门口：“这么小的乐器，怎能发出如此有穿透力的声音？”她即兴将口弦琴抵在唇边，演奏中，仿佛世界都听见了塞上江南的千年古音。

此后，安宇歌的足迹遍及亚非欧。一次在西班牙孔子学院授课的经历让她记忆犹新。“我让现场观众把眼睛闭上，只用耳朵去听。”口弦轻颤，簧片震动，仿佛雨水敲打铁盆，无数观众在这种陌生的旋律中沉醉。

演出归来，安宇歌的焦虑仍在：“会弹口弦琴的妇女大多年龄大了，年轻人觉得它‘土’。”她深知，一味固守传统，口弦琴将失去未来。

守艺之困，催生着破局之思。走进安宇歌的工作室，竹制、骨制等各式口弦琴陈列其中。“竹口弦琴以薄竹片制成，两端穿线通过扯动发声；铁口弦琴则以金属材质为主，音色就更清亮。”安宇歌演到哪里，就搜集、研究当地的口弦琴，不仅复原了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的口弦琴制作古法工艺，还创造性地将竹口弦琴与铁口弦琴结合，通过改良琴体结构，让其音色更丰富，造型也更精美。

口弦琴之外，安宇歌还与团队成员协作，将宁夏的各类民间乐器一一整理、复原。一团黄胶泥，捏成牛头形状，上开六孔，徒弟用双手轻抚，气息流转中，发出如塞上风声的浑厚音色。“这个乐器叫泥哇呜，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此外，还有篦子口弦、单弦琴、桦树皮鼓……至今，安宇歌率领团队研制口弦乐器上千把，复原宁夏地域性传统乐器三大类百余件。

这几年，安宇歌与儿子合作，成功复刻了陕西石峁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绳振式骨制口

弦琴，重现了古代人类的原始音韵。

“石峁口弦琴两端有用于固定拉绳的圆孔，通过拉动连接簧片的绳索，使簧舌振动并引发空气共振发声，按口弦琴大家族中的演奏方式来分类，属于‘拉簧’。”工作室里，安宇歌展示石峁口弦琴的照片，这种口弦琴由兽骨制成，制作时需经过切磨骨片、剔刻簧舌、钻孔等工序。“簧舌的精细度直接决定音色质量，而石峁口弦琴厚仅1—2毫米，中间嵌着一个又细又薄的簧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绳振式自体发声结构。”

“复原过程，材料成为一大难题。”为了复原古人类的原始技艺，安宇歌和儿子依次尝试了马骨、鹿骨、牛骨，制作过程不能用机械类工具，尽量用原始的加工方法，一点点打磨，最终得到最接近出土文物的口弦琴。

复原而来的石峁口弦琴，从结构到演奏方式与当今别无二致。“4000年没有变化，与宁夏现在流行的绳振式竹制口弦琴相比，只不过少了一个增加音色的小配重块。”安宇歌说，这样的“活化石”，为研究中华音乐起源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口弦琴是我们的魂。”工作室里，安宇歌的案头堆满口弦琴和手稿，其中既有自己采风的泛黄笔记，也有儿子设计的彩绘琴体。

琴声如丝，缠绕着六盘山的云雾、黄河两岸的沙砾。

左上图为安宇歌演奏口弦琴。

秦瑞杰供图

从冀南币到人民币

颉博洋
刘冬梅

秦瑞杰供图